

「虫」与「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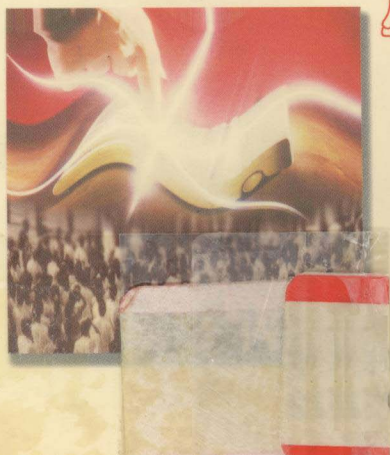
贵州人才生态环境透视

史继忠 著

的辨析

《贵州：让历史
告诉未来》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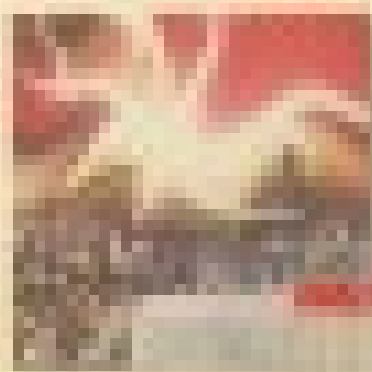
神奇的喀斯特王国
绿色的诱惑
无形的链结
“黔军”出山
我们都是贵州人

□ “虫”与“龙”的辨析

贵州民族出版社

「虫」与「龙」的辨析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llegible]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

贵州省史学会

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编

『虫』与『龙』的辨析

——
贵州人才生态环境透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虫”与“龙”的辨析: 贵州人才生态环境透视/史继忠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12
(贵州: 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
ISBN 7-5412-0929-5

I. 虫... II. 史... III. 人才成长-社会环境-研究-贵州省 IV. C9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711 号

“虫”与“龙”的辨析

——贵州人才生态环境透视

责任编辑: 刘 磊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潘 松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 550001)

电 话: (0851) 6829260(总编室) 6826871(发行部)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字 数: 131 千字

印 张: 5.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厂家负责调换。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

顾 问 组

组 长：龙志毅

成 员：王中刚 蒋希文 薛永应
石 争 吴雁南 黄钧儒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任：鲁 石 冯祖贻

副主任：田 茂 肖先治 熊宗仁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晓麟	王恒富	史继忠
卢惠龙	伍席源	向阳生
刘学洙	李万寿	杜文铎
何慰先	张祥光	范同寿
林建曾	侯绍庄	顾朴光
徐 圻	高宗文	高 宁
湛贻琴	谢合宽	管远祚

编 辑 部

主 任：熊宗仁

成 员：林建曾 罗晓萍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是贵州省史学会和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9年春节前就已决定共同联手启动的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而它的酝酿则早在1997年12月，起初拟议中的书名为《贵州历史研究》丛书。自与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联手以后，学者们受到企业家经营管理经验和竞争意识的启发，经过有关专家、学者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者反复切磋、构思，才有现在的名称。我们的初衷是为贵州制定“十五”规划和迎接新世纪、提供学者群研究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某种思路和一得之见。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丛书组织者与作者对贵州问题的真知灼见。

丛书选择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甚大的若干方面或领域，形成一系列研究选题，每个选题独立成书。通过用点、线、面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走进贵州历史的真实。以发散思维、逆向思维和超前思维的理性沉思，对富民兴黔提供某种启示或某些思路，使历史科学的隐形价值变为现实的经济、社会价值。这是我们的热望和努

力追求的目的。

1999年5月21日，贵州省史学会、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新闻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向社会公布丛书编写的目的、意义和第一批选题，以类似招标的方式向社会征求新的选题和选题承担者。丛书的立意和运作方式，冲破传统的历史研究的规范，深深地楔入现实，撞击着关心贵州现状和未来的人们的心灵，引起了贵州学术界一种较普遍的理性震撼。在关注它的人们心中掀起了背靠历史，直面现实，期许未来的新风。

这新风，新在立意。丛书打破学科、部门和系统的界限，以历史作为切入点，以中国的未来作为参照系，尽可能集中省内外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的心智，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多层面，对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观照。让更多的人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思想营养和精神力量。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的真相和丰富内涵，而且展示历史能告诉未来什么，以及它怎样

去告诉未来。经过丛书的诠释,“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名言便生气勃勃地与贵州各族人民在 21 世纪的伟大事业声息相通,休戚与共。不仅给贵州的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给整个贵州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省情知识的普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多方面,都变得浅近而真切。

这新风,新在运作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与企业联姻司空见惯,但大抵是一方系“贫僧化缘”,解决科研经费短缺;另一方是“出血”以回报社会或自树形象。而贵州省史学会与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是基于双方对贵州的忧患意识、危机感和加快贵州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合作中,前者除了获得经费资助外,更是借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船下海,走向市场,获得前瞻性的思考以观照现实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广泛引入竞争机制,以历史科学来整合各社会学科群体优势,实现思想资源的重组,实施精品战略,探索双向或多向选择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而后者作

为贵州有卓越表现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不仅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为丛书的编写出版无偿提供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而且基于未来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科技文化的竞争的认识，从策划、编辑、出版、发行全方位地介入，努力使企业的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层次。另外，丛书一反设置主编的常规，根据具体选题由编辑部聘请专家评审，并明确一位专家主审或作为特约编审，集体负责书稿的质量把关。丛书的选题承担者，采取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产生。不少对该选题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成了这套丛书的主要撰稿人，令人欣慰。贵州民族出版社作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者，也先期介入，形成策划组织者、作者、编审者和出版者群策群力、优势互补而又责有所归的运作方式。因此，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尽管有署名作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都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是老、中、青三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相结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启动之日，正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角吹响之时。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一时成为贵州全

省上下思考议论的热点，也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丛书的立意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仿佛是独得先机似的合拍。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实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和民心民意。而贵州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理论触角、学术良知和使命感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民的需要使然。

历史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任何事业的成功者，都是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智者。我们要把握未来，就必须在现实中组织历史的军团去参与向未来的进军。

这套丛书将以真实的历史为思想的基石，实话实说，唤醒贵州全省上下的危机感、使命感。使贵州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了满腔热情之外，多一些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理性思考。有历史的警钟长鸣，历史的启示常驻，才会有历史的创新！

《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

2000年10月

注：中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写这本书的想法

“西部大开发”简直成了大会小会、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各种新闻媒体都高奏起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西部许多省区已找好了自己的位置、瞄准目标，开始起跑了。贵州怎么办？贵州人的心情显得格外急迫，希望在这新一轮的竞赛中，贵州能挪动一下在全国排名榜上的位置，实现兴黔富民的美好愿望。历史的机遇又到来了，贵州和中西部其他省区一样，都取得了参赛权。竞争是激烈的，犹如在运动场上，能否获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员的素质。在知识经济面前，资源的优势已经下降到第二位，而人才的优势突显出来。所以这场竞争，与其说是资源与设备的竞争，倒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贵州能不能追赶上去，“八大优势”也罢，“六大优势”也罢，归根到底，要看人才的状况如何。

有必要清醒过来，冷静地反观一下贵州的人才生态环境，这关系着贵州的现在和未来。既然副标题是《贵州人才生态环境透视》，它的主题词当然是“人才”的“生态环境”，而且，落脚点放在“贵州”。不言而喻，“透视”是要有穿透力的，穿透五脏六腑，看个究竟，察其所以。围绕着认定的对象，我们选择了四个视点，即育才、识才、用才和聚才，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探测贵州人才的生态环境。中心都不离“才”字，而“育”、“识”、“用”、与“聚”则是它的四个重要支点，或者说是人才成长的四个重要环节。我们无须主观臆断，一切都让历史说话，能说些什么就说什么，历史是一面镜子，兴衰起伏都显现其中。我们从浩繁的史事中，找出了若干典型的



个案,在述说中加以剖析,咀嚼历史的滋味,酸甜苦辣,各自品尝。成功的,可以令人兴奋,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失败的,固然使人感到苦涩,但亦可引以为戒。有的虽然只是一种特例,但仔细玩味,或许也有些启发,引起一些思考。

拉开历史的长焦,对着贵州的育才环境,看到的情景,在欣慰与喜悦之中,不免有几分焦虑。自明代贵州开省以来,学校渐兴,人才联袂而起,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全国的大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才华,领了数百年的风骚。贵州人才之舟在明代启航,并非无因。从皇帝到地方官吏,从流官到土官,从官府到庶民百姓乃至贬官,都重视教育,贯彻“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沙滩只是黔北一个僻静的村落,在清代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曾经放出奇光异彩,涌现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大家,还形成了一个卓异的文人群体,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寻找这个失落的文明吗?如果说遵义是文士的渊藪的话,那么兴义可能就是武人的策源地,这或许与清末的笔山书院有关。两千年儒、道、释三家都没有“化”到的威宁石门坎,为什么会被基督“化”了呢?出了30多个大学生、2个博士,是神的威力还是教育的力量,值得深思。回顾这半个世纪的贵州教育,令人欢欣鼓舞,人才成批涌现,育才环境大为改观,可以说是贵州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谁也无法否定它辉煌的成就。

可是,当我们换上一个时代的广角镜头,放眼全国,再看看贵州。在纵轴与横轴的交点上找到了贵州的坐标位置,远的不说,就谈现状,图像上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剪刀差。文盲数处于高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却处于低位,而且越往高的层次所占的比例越小,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忧。同是从改革开放的起跑线上一一起出发,别的地方突飞猛进,而贵州的高等教育却出现了“两无”状况,即无全国重点大学、无全国重点学科,这难道不应当认真去反思吗?回溯往事,有时不免有些苦涩,也有些难言之隐,但真的勇士,

必须敢于面对现实,下定“十年生计,十年教训”的决心,“卧薪尝胆”,奋起直追。贵州的希望,在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优化自然生态环境,优化培养人才的生态环境,才是惟一可行的出路。

识才是个重要的环节,也是人才能不能涌现出来的关键。自古以来人们都传颂着伯乐识马的故事,无非是希望世上多有几个伯乐,让天下的“千里马”奔驰于世。这是一种渴望,渴望有人能够识才,不至于把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埋没地下,变成“废材”和“困山材”。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其间有许多纠葛与困扰,把人事关系搅得浑浑噩噩。所以,我把识才譬喻为一个“难解的方程式”。人们期待的伯乐,如果只是一个高士,手中无权,即使看中了你是“千里马”又有何用?顶多算是找到了一个知音。像丁宝桢这样有职有权的人,他有伯乐的慧眼,又有敢于用人的魄力,用一个人兴一件事,用一批人成就一项大业,所以他在山东、在四川都很有政声,至今仍活在人们心中。可惜,这样的伯乐太少了,更可惜他没有镇抚贵州。另一个贵州先贤李端棻,他识拔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严修等一批精英,结果落得个“滥保匪人”的罪名,发配新疆,这简直是对伯乐的一个巨大讽刺。严修的人才观,直到今天仍然是超前的,他主张“破格求才”,不限地域,不拘数额,不论其功名、地位和身份,只要有“非常之才”便当量才录用,充满开放意识。他身体力行,在贵州做了三年学政,极力“搜寻人才”,得高材生40余人,精心培养,后来都成了有用之才。然而贵州并不那么有幸,来贵州做官的总有一些“盲眼人”。他们来到贵州,恨不得朝夕离去,根本无心关注人才,以致形成一种“贵州无人”的潜意识,严重障碍了人才的成长。

当然,人才的识别从根本上讲还得依靠制度。我说“科举倒也帮了贵州的忙”是有根据的,若是明清不在贵州开科取士,恐怕连丁宝桢、李端棻也做不了大官,文学之士更是湮没无闻。但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况且,制度要靠人去执行,

在制度人格化的过程中,问题就出来了。掌权者如果心明眼正,自然可见真才,但若果遇着“眼斜心不正”的人,就会把正才看成“歪才”,把歪才看成“正才”,造成许多悲剧,这就涉及到本书的正标题《“虫”与“龙”的辨析》。在这个单位被视为“虫”的,在那个单位可能会成为一条“龙”;在贵州被视为“虫”,甚至是“懒虫”、“害虫”的,出了大山却显得生龙活虎。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识才不当是人才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话又说回来,被识别的对象也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稍有走眼,便颠倒了盗跖、颜渊。“你办事,我放心”,说不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重要的识才原则,因为是“不成文法”,或者说是“习惯法”,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事情的核心在于无可奈何的长官意志,还有那密密麻麻而又隐隐约约的关系网,使得不少有才之士根本难以“入围”,以致在组织、人事部门的天平上根本称不出他们的重量。在改革开放力度较大的地区,因为人才的可动性增强,或许稍好一些,而贵州可能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莫说干部任免,就是技术职称也受到侵袭,“假冒伪劣”往往有之。不过,我想这个难解的方程,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思想进一步解放,加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或许可望解出某种结果。

然而,无论是“育才”还是“识才”,终归是为了“用”。所以,“用才”是它的终极目标,也是检验人才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标识。人们常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倘能如此,用才问题就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这两句话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人们把它当作了口头禅,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念了不知多少年,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有时甚至判若天渊。当我最初看到贵州龙的时候,感到十分诧异,怀疑它只是龙的幼儿,甚至根本不当是“龙”,因为,它和我想像中的龙,特别是庞然大物的恐龙全然不同。“贵州龙”小得可怜,只有十几厘米,顶多几十厘米,就像是一条四脚蛇,完全没有龙的气派。可是,专家们告诉我,它的确是龙,其远祖与恐龙同宗,只是后来因生态环境不同而产生如此巨

大的分异。贵州龙为什么长不大？根本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影响。那么，贵州人才的生态环境是否会影响人才的成长呢？当我研究贵州历史人物的时候，这一规律得到了印证。大凡知名度颇高的人，他们的事迹多不在贵州，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名并不在贵州。古代是如此，近现代似乎也是如此。拿地质三教授丁道衡、乐森珪、罗绳武来说吧，他们是同乡、同年、同学、同行，而且在地质上都作出了贡献，但结局并不相同；谢六逸是在外地成了名的，回贵州后事业不但没有获得发展，而且最终因“贫病交加”、“心身交病”，死于梦里依稀的故乡；黄齐生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他之所以离开贵州，主要是受到周西成的通缉；就连国民党的重要军政人物何应钦、谷正伦，他们也是“五旅之争”被撵出去的将军；张道藩死里逃生，后来才做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立法院院长。

能不能出人才，关键在于英雄是否有用武之地。抗日战争期间，贵州成了抗战的大后方，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但贵州籍的精英大都回来了，而且全国许多知名人士也云集贵州。我之所以要写“文通广招天下客”，是把它当作一个吸引各种人才的真实范例。一个小小的文通书局，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跃而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气概。文通书局成立了一个全国第一流的编辑委员会，集中了国内知名的包括文科和理科的专家学者，在人才荟萃的情况下，文通并没有因为外地来了许多名家，便瞧不起本地的专家学者，而是将他们一道请了进来；在贵州籍人士已有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文通也没有采取关门主义，对外来的专家进行排斥，而是约请他们一起共同发展贵州的文化事业。因为能汇纳百川，所以才能“文通四海”。文通高明之处，在于能审时度势，广开才路。它有“广招天下客”的气度，所以人才归之如水之就下，而不是像白衣秀士王伦那样，心胸狭小，容不得人；它有识别真才的能力，把省内、

国内有真才实学的人都请了进来，而不是像徒有虚名的孟尝君那样，虽有食客三千，却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它真心实意地引进人才，而不是像叶公好龙那样，只是做出一种姿态，待真的龙来了，却又怕得要死。

我们看到一个奇异的“贵州现象”：一方面是人才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又经常叫喊“缺乏人才”。流出去的，不管是在北京、上海、东南沿海或其他地区，也不论是在政界、科技界、学术界、工商界、金融界，都不乏卓越的人才，他们既然能在那些人才荟萃的地方大显身手，出人头地，说明他们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可是，当他们还未走出大山之前，谁又看中这些人的才呢？甚至根本没有进入贵州的人才库，即使入了库，多半也被闲置一边，束之高阁。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它是和“缺乏人才”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他们有才而不被视为人才，怀才不遇，只好一走了之。犹如孔雀，在这里找不到它的栖息之所，没有它展翅高飞的空间，还不时受着一些顽童的驱赶，于是格格驾飞，还带走了一批麻雀，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

贵州果真“缺乏人才”么？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破除那种由来已久的“黔中无人”论。打消历史的成见，像严修那样去认真“搜寻”。严修的话是对的，他认为不能发现人才的官员必须受到惩罚，因为这样的官，要么就是有心埋没人才，要么就是尸位素餐，饮食终日，无所用心。古代的姑且不去说它，就拿近50年的情况来说吧！解放以后培养多少人才不是已明明白白地写在《光辉50年·贵州》里了吗？我想，谁也不会去否定这样的事实。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长期以来，中央每年都要把一批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研究生分给贵州，还有在外地求学的贵州人毕业后回乡的，这种“出口转内销”的也不知有多少？更何况，“三线建设”调到贵州的高科技人才数以万计，来自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北京航空学院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都有，这不是现现成成的人才

吗？然而，他们来到贵州以后，都被抽象成为一堆统计数字，被淹没在人口统计数中，承认他们是“人”，而抹去了他们的“才”，也就是说，“人”与“才”被分离了。贵州留不住人，这是历史的悲哀。抗日战争期间来的大量人才，后来走了不少，这也倒是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来贵州主要是为了逃难，既然抗日战争胜利了，当然要重返家园。可惜的是那些得来复失的精英：随大连医学院迁来的人大都走了，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人也多半离去，“三线建设”调来的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留下来的也实在不多。

引进人才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不注入新鲜血液，就会缺乏新的生机。但这决不仅是做出一种姿态，重视人才、开放精神，需要实实在在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今天引进的固然有的是人才，但如果认为昨天和前天引进的就不是人才的话，那么，今天引进的人才到了明天，又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教授，无论本地或外来的都可以平等竞争，为什么外来的就一定要比本地的受到优待呢？不错，许多地方都有高薪聘请的事例。譬如深圳，整个地区的工资都高于其他地方，任何人都可在那里竞争上岗，但“优惠券”不仅仅是给外来的人，对本地人也一视同仁。既然是尊重知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知识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既然是尊重人才，本地的人才为什么又不在尊重之列呢？说穿了，还是“黔中无人论”的思想在作怪，不去探寻人才的优势为什么得不到发挥的原因，反而埋怨“贵州无人”。韩愈说得好：“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人才流动，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无论是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的。但是，在人才竞争激烈的今天，人